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引入、继承与融合

谢 芮

(北京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谭载喜提出的译学研究两大矛盾,结合蓝红军和穆雷、邹兵的分析模式,将中国译论研究的发展分为三种模式:横向引入西方理论、继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思想、平行融合跨学科发展翻译理论,并分析每种模式代表人物的观点,就每种模式的中国译论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国翻译; 翻译理论; 译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0)05-0040-05

一、研究背景

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研究历史。“译学”一词,始于20世纪30年代^[1]。董秋思^[2]首次使用了这一说法,将翻译研究视为科学。尤其是在1987年“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之后,中国当代译学遍地开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中国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开始注重中国的翻译学理论是否成体系,如何才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3-5]。其中,郭建中^[6]指出,中国传统译论大都为经验之谈。杨晓荣^[7]也谈到,学术研究中的流派是研究深化的表现,而中国的翻译研究,由于在整体上不善于理论提炼,研究方法不够深入等问题,没有流派的出现。然而,蓝红军^[8]却通过总结1987—2017年中国译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认为中国的理论建构并非乏善可陈。在丁振琴^[9]的访谈中,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也表示,“系统性”并不是衡量学术发展质量的首要标准,人类生活本就存在不完美的结构,完美的结构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要指出不同学者对中国译学建设成果的不同结论,是因为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涉及中国未来的译学建设走向。中国翻译研究之所以能呈现今天的新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十多年来不间断地对国外,特别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与介

绍^[10]。随着我国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趋势,有些学者发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呼声^[11-12],提出“取得中国译学的话语权,在国际译学的研究中发出中国的声音”^[13]。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一思想,“以中国语言文化现实为一个立足点的中文翻译研究,‘中文特色’是其天然的研究出发点(而非终极目标)”^[14]。

正如谭载喜^[15]列出的译学研究两大矛盾,第一对矛盾是“翻译思想和理论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第二对矛盾为“如何处理译学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新旧理论话题的矛盾”。第一对矛盾主要涉及翻译学者在中国本土译论和西方译论之间的态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方面的争论正是这一矛盾的折射。由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起步晚于西方,所以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引入西方译论的时期。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打破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盲目崇拜,证明中国译界对西方译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因此,梳理我国引介的西方译论,对于“自我”与“他我”这一当今译论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进行研究尤为重要。关于第二对矛盾,谭载喜列举了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思潮,强调从文化视角重新定义翻译理论。笔者认为,除文化研究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翻译研究还出现了技

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谢芮,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译论、口译。

术转向^[16]、社会学转向^[17-18]、心理学转向^[19]等。这些转向都反映了新时代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同时,中国的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碰撞,如何在新旧交替中做好理论的继承创新,也是摆在中国译界面前的一大挑战。

二、研究介绍

蓝红军^[20]根据“理论之后”这一新时代理论性学科的共同特征,探讨了今后翻译学理论的发展路径。他认为,新时期之前的翻译理论建构可大致归纳为三种模式,见表1。

表1 新时期之前翻译理论建构的三种模式

建构模式	理论来源	理论关注	理论目标	理论举例
自下而上	翻译实践	规律与规范	指导翻译实践	“信达雅”论、“神似化境”论、“三美”论、功能对等论
自上而下	哲学	现象与本质	认识翻译本质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平移征用	其他学科	体系与结构	解释学科结构	翻译社会学、翻译生态学、翻译伦理学、翻译地理学

此外,穆雷、邹兵^[21]从外国译论研究、传统译论研究、本土译论建构三个方面,剖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分别指出了当前各自存在的问题。蓝红军和穆雷、邹兵的研究模式具有共同之处,相辅相成,两篇文章都立足中外,对未来中国译学理论和翻译学科建设走向具有借鉴意义。

本研究基于谭载喜提出的译学研究两大矛盾,结合蓝红军和穆雷、邹兵的分析模式,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分为三种模式:横向引入西方理论、继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思想、平行融合跨学科翻译理论,见表2。本研究将分别介绍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分析其优点和缺点。

表2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	理论来源	理论关注	理论举例
横向引入	西方译论	翻译规律与规范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德国功能学派目的论
传统继承	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美学	用中国传统思想解释翻译现象与本质	“信达雅”论、“神似化境”论、翻译美学理论
平行融合	其他学科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技术转向、社会学转向、心理学转向

三、研究分析

(一) 横向引入

横向引入的发展模式指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涌入中国^[22]。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会议、杂志期刊热烈讨论西方翻译理论。

屠国元和肖锦银^[23]将引入中国的西方译论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译介性质,常以简介、译介或者书评的形式出现,节译、编译等也可归入此类;第二类具有研究性质,包括对比不同译论家的翻译思想或研究某一个译论家的思想发展过程,得出结论供中国译论发展借鉴;第三类属于反思和应用性质,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思考分析,或将西方译论应用于实践,试图找出其可行性。第三类的著述能够有机结合中国翻译研究现状与西方译论,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博采众长、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学界积极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对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展开了多层面、多

途径的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的研究中提升理论认识;又在理论的指导下,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24]。本研究旨在分析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译论的贡献。在横向引入这一部分,最能够代表中国学者贡献的显然为第三类西方译论著述,即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思辨,有机结合国内外的翻译研究。

奈达的动态对等论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其基本思想为“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再生与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对等,首先是意义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25],以及“接收者反应也应高度对等,否则翻译就无法达到目的”^[25]。奈达的这一思想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金隄提出了批评,在“效果”等方面,他与奈达持有不同的思想。

金隄^[26]认为,翻译的“效果”应该是信息接收者的“感受”,而不是奈达所说的“反应”。因为“反应”包括行动,翻译信息对于信息接收者的作用应该有别于接收者的反应或行为。信息接收者的行为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因素等诸多原因的影响,所以“反应”不应该是翻译追求的目标。

金隄^[26]还指出,等效翻译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译文与原文虽然在形式上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一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这就是等效或基本等效,这个目标应该适用于一切种类的翻译。在等效论下,金隄^[26]讨论了翻译的取舍问题。他认为,翻译是信息的传递,翻译中的“信”或“忠实”自然应该是指信息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等同。信息传递要达到目的,必须是接收者能够顺利接收的。等效论的取舍,就是全力以赴保证“信”与“顺”的统一,以求译文产生与原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效果,为此准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放弃语言形式上的相似。但在追求等效的过程中,并不排除形似的可能性。如果译文采取类似原文的形式更有利,自然要采用这种形似。

可以说,金隄仍是奈达动态对等理论的拥护者,但是他在奈达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在接受者概念上,强调原文和译文信息接收者“感受”一致,排除了外部因素的干扰,强调翻译要时刻以信息接收者为重。其次,在效果概念上,认为接收者收到的信息应该在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上是对等的,细化了“等效”概念,为翻译质量评估和分析提供了借鉴,同时能够指导译员在翻译实践中注意这三方面的对等。最后,在对等概念上,金隄^[26]还表示,翻译中的“信”与“顺”是译员取舍时应达到的前提条件,之后再考虑形式对等的问题。虽然达到完全等效很难,但是在翻译工作中,译员需要确立等效的目标,尽善尽美。金隄强调“信”与“顺”,与严复“信、达、雅”标准中的“信”与“达”有相似之处。“信”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无论翻译何种文章,都需要做到对原文的忠实;“顺”或“达”指通顺易懂地表现原文的思想内容,由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不同,有时译员需要在翻译中对原文形式做一定的调整,才能做到通顺易懂地达意。这就要求译员在翻译实践中,找到“信”与“顺”的平衡点。当然,金隄还提出,追求等效的过程并不排除形似的可能性,所以译员在翻译时还需要考虑译文的形式,做到等效的最大化。

然而,遗憾的是,金隄并未就等效的标准再展开深入的讨论。例如,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没有详细的说明,交代得比较笼统。翻译的“效果”应该是信息接收者的“感受”,那么如何来衡量信息接收者的“感受”是否一致?这些都是译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 传统继承

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主要

汲取了中国哲学、美学,以及文化文学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系统性的翻译理论著作,但是翻译思想却隐藏在哲学、美学及文学、诗学等作品当中。

在哲学上,中国传统译论深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个人经验”“实践为中心”“直觉诗性体认”的内省式思维范式^[27]。严复的“信、达、雅”译论、茅盾的“切要”“形貌和神韵”、林语堂的“信、达、美”、钱钟书的“化境”等,都深受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影响。在当代,朱纯深^[28]借用太极道家哲学,把翻译比作两种语言之间的推手,翻译的本质“就是催生一次语言间的推手,以此努力去达致一个更丰富、更宏大的身份认同,养育自己的语言使之接近纯语言,在后者的神性中得到终极的救赎”。王智峰、王和平^[29]传承《易经》中“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思想,分析了“道”在翻译研究各方面的不同阐释。

在美学上,刘宓庆^[30]将翻译美学纳入翻译理论体系,阐述了翻译美学的定义、范畴和规律。姜秋霞^[31]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审美。席蕊^[32]指出,中国翻译美学观念深受传统哲学的影响。模糊美、音形意的对称美、对美的整体感知是中国翻译美学的三大特点。许多中国学者的翻译思想恰恰符合这些特点。例如,钱钟书的“化境”思想,与音形意对称美一致。

刘宓庆是翻译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在《翻译美学导论》^[33]一书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翻译美学框架,阐述了翻译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翻译的审美客体就是译者所需要翻译加工的原文,其依附于源语的审美构成,对应于源语的审美效果,容许审美主体感应的灵活性,容许历史发展对其审美价值产生可变性,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具有层级性。而翻译审美客体的本体属性表现为审美构成,分为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的语言审美。形式系统为审美符号集,翻译的形式系统审美分为语音层、文字层、词语层、句段层的审美信息。非形式系统的审美为审美模糊集,分为情与志、意象与意境、超文本意蕴。对审美客体的观照集中于翻译的语言审美,所有的翻译都需要经历根据原文选词择语、修辞炼句、传情达意、谋篇布局等语言加工程序。翻译中的“择善从优”就是语言的审美操作。

翻译的审美主体就是翻译者。翻译审美主体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受制于审美客体,表现在受制于源语形式美可译性限度、源语非形式美可译性限度、双语文化差异、艺术鉴赏时空差。翻译审美主体的

第二个基本属性为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取决于审美主体的情(审美主体的情感含蕴及审美主体的情感感应)、知(认知)、才(行文能力或艺术功力)和志(毅力)。

刘宓庆提出的翻译美学,尤其是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翻译审美应是译员的一项基本功。分析翻译审美客体的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信息,能够准确把握原文的脉络和意义,根据原文的审美信息在翻译时斟字酌句、组织行文。翻译不再是字对字的机械转化,而是受到了美学的涤荡和陶冶,翻译活动也是美的艺术。其次,虽然译者受到原文制约,但强调翻译审美主体的翻译者主观能动性属性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正如郭沫若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翻译审美确实能够赋予译者创造性,使译者不懈追求语言翻译的表现美。最后,刘宓庆还详细阐释了在翻译或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模糊概念——“情”“志”“意”“象”。审美是感性的活动,翻译审美的关键在于对情感的把握,这对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也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三) 平行融合

Gambier、Doorslaer^[34]通过梳理人文社科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翻译跨学科研究,认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三十多年来的“理论补课”让中国的翻译学者与翻译工作者明白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如今的翻译与翻译研究是与多学科相联系的,因而无论是研究翻译还是做翻译,都须兼备更广的视野与跨学科的思维^[10]。孙艺风^[35]指出,现代翻译学缺乏贯通性,跨学科研究在保持翻译学活力的同时,却必定会稀释翻译学的专业特性。唯有通过真正的跨学科对话和良性互动,才能促进翻译学的长久发展。

翻译理论研究的平行融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转向”的盛行。在技术转向上,张霄军、贺莺^[36]表示,当今技术发展为口笔译工作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生硬的机器翻译已经升级为基于真实语料的智能翻译,机辅翻译技术和机器翻译的融合促进了译后编辑代替翻译记忆,云翻译技术也应运而生,改变了现有翻译的工作模式,因此发生了翻译的技术转向。也就是说,随着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术语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实践发生了从纯人工翻译到人工翻译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变革。

在社会学转向上,王洪涛^[18]指出,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为社会与翻译的相互影响。社会翻译学应结合定量和质性方法、共时和历时研究,“客观准确地描述、阐释和预测翻译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共变关系”。而付敬明^[37]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学研究不等于翻译学加上社会学,社会学翻译研究的视角应着眼于翻译问题的解决,翻译问题不能等于社会问题。

在心理学转向上,中国学者基本围绕翻译过程的探索及译者本身的心理思维活动等问题展开讨论。吕航^[38]提出了建立翻译心理学的构想,认为翻译涉及诸多心理和思维活动,翻译研究要往深层次发展,就必须结合心理学研究探索翻译的内在机制。颜林海^[39]进一步指出,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翻译心理学主要研究双语加工模式和心理词汇提取等。王柳琪、刘绍龙^[40]利用符号加工范式,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构建了翻译中的信息转换模型。

颜林海^[19]阐释了翻译认知心理学的定义、对象和研究方法。他把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翻译阶段、语码转换(翻译理解—翻译表达)和后翻译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信息加工模型加工的。在颜林海提出的翻译认知加工模型中,翻译控制包括翻译意图预设、意图比对、意图选择和意图核定。意图预设中的意图分为译者意图和他人意图,根据这些意图,译者开始选择和浏览文本。意图比对指译者根据翻译控制中的译者意图和预设意图,再决定是否翻译。意图选择指译者在译者意图和原作者意图之间选择编码策略(即翻译策略)。意图核定指译者根据预设意图检查核实翻译。颜林海提出,翻译控制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元认知知识对翻译任务的计划、监视和调节,这一步贯穿在译者对翻译认知加工的管理和控制中。

颜林海构建的翻译认知加工模型详细解释了译者的翻译流程,各个步骤无缝衔接,重点关注译者本身,打破了翻译研究重客体(翻译产品)、轻主体(译者)的传统。应用认知心理学也是翻译研究迈向科学化学科建设重要的一步。

颜林海提出的模型与认知心理学有关,翻译控制也是认知加工模型的一部分。他也提出了元认知概念,认为译者应根据自己的元认知知识对翻译任务进行计划、监视和调节。不过,元认知控制和认知控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确定控制到底是属于元认知范畴还是认知范畴仍然不清楚。在翻译中如何区分元认知和认知,仍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结语

笔者基于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概述,从横向引入西方译论、继承中国传统译论、跨学科融合翻译理论三个方面,总结了我国译论的发展模式。

从这三种模式的发展来看,中国译论仍然存在感性现象,还有些研究缺乏有条理的分析和系统的讨论,平行融合也仍未成体系。在西方译论的引入方面,译论研究者不能盲目地相信、崇拜西方理论,而是需要全面认识和批判反思西方译论。在中国传统译论继承方面,翻译研究者还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推陈出新,传承中国的传统译论。在学科融合方面,学者需要充分考虑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和适用性,以解决实际翻译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翻译研究,为中国本土译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Luo X M, Lei 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 [J]. Perspectives, 2004(12):20-30.
- [2]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J]. 翻译通报, 1951(4):3-6.
- [3] 穆雷. 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探索[J]. 中国翻译, 2018(6):9-11.
- [4] 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8.
- [5] 谭载喜.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6] 郭建中. 简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J]. 中国翻译, 2000(5):66-67.
- [7] 杨晓荣. 略谈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2):39-42.
- [8] 蓝红军.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87—2017)[J]. 中国翻译, 2018(1):7-16.
- [9] 丁振琴. 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翻译学——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3):83-86.
- [10] 何刚强. 自家有富矿, 无须效贫儿——中国的翻译理论应当独树一帜之理据[J]. 上海翻译, 2015(4):1-8.
- [11] 谭载喜.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J]. 中国翻译, 1998(2):12-16.
- [12] 杨自俭. 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 中国翻译, 2000(5):4-7.
- [13] 潘文国. 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 [14] 朱纯深. 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J]. 中国翻译, 2000(1):2-9.
- [15] 谭载喜. 译学研究中的理论话题:发展动态与当下两对主要矛盾[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4):4-6.
- [16] 张旭东, 张伟. 翻译的技术化倾向述评[J]. 外语研究, 2016(5):88-91.
- [17] 任文. 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Claudia Angelelli 教授对话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1):70-76.
- [18] 王洪涛. 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J]. 中国翻译, 2011(1):14-18.
- [19]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 [20] 蓝红军. “理论之后”翻译学的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 2016(5):5-6.
- [21] 穆雷, 邹兵. 翻译的定义及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J]. 中国翻译, 2015(3):18-24.
- [22] Tan Z X. The ‘Chineseness’ vs. ‘non-Chinese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J]. The Translator, 2009(15):283-304.
- [23] 屠国元, 肖锦银.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 中国翻译, 2000(5):15-19.
- [24] 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J]. 中国翻译, 2018(6):5-8.
- [25] NIDA, Eugene A,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26] 金隄. 论等效翻译[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6(4):6-14.
- [27] 朱瑜.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辨[J]. 中国翻译, 2008(1):12-15.
- [28] 朱纯深. 翻译的阴阳诗学——太极推手、浩然之气、纯语言[J]. 中国翻译, 2019(2):5-16.
- [29] 王智峰, 王和平. 翻译的“道”与“器”——对我国翻译理论构建之建议[J]. 上海翻译, 2019(2):39-44.
- [30] 刘宓庆. 翻译美学概述[J]. 外国语, 1986(2):46-51.
- [31]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32] 席蕊. 论中国哲学思想下的特色翻译美学[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102-105.
- [33]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2.
- [34] Gambier Y, Doorslaer L V. Crossings B.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 [35] 孙艺风. 翻译学的何去何从[J]. 中国翻译, 2010(2):5-10.
- [36] 张霄军, 贺莺. 翻译的技术转向——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侧记[J]. 中国翻译, 2014(6):74-77.
- [37] 傅敬民. 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4):91-97.
- [38] 吕航. 关于建立翻译心理学的构想[J]. 外语研究, 2000(3):29-31.
- [39] 颜林海. 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106-110.
- [40] 王柳琪, 刘绍龙. 翻译信息转换模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基于符号加工范式的思考与构建[J]. 中国翻译, 2009(6):20-24.

[责任编辑 亦 筱]